美丽的微笑与爱

（1979 年）

□特雷莎修女

穷人是非常好的人。一天晚上，我们外出，在街上带回了四个人，其中一个岌岌可危——我告诉修女们说：你们照料其他三个，我照顾这个濒危的人。这样，我为她做了我的爱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我将她放在床上，她的脸上露出了如此美丽的微笑。她握住我的手，只是说“谢谢您”，随后就死了。

我情不自禁地在她的面前审视我的良心，我自问：如果我处在她的位置上，会说些什么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会试图引起别人对我的一点关注，我会说：我饥寒交迫，奄奄一息，痛苦不堪等等。但是，她给我的要多得多——她将其感激之爱给了我。然后她死了，脸上还带着微笑。我们从阴沟里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也是这样。他快要被虫子吃掉了，我们把他带回了家。“在街上我活得像动物，但我将像天使一样死去，因为我得到了爱和照料。”真是太好了，我看到了那个男人的伟大，他能说出那样的话，能够那样地死去：不责备任何人，不辱骂任何人，与世无争。像一位天使——这便是我们的人民的伟大之处。因此我们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我饥肠辘辘——我无衣蔽体——我无家可归——我不为人要，不为人爱，不为人管——而你却对我做了。

我认为，我们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工作者。在人们的眼中，我们或许是在从事社会工作，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在世界的中心沉思冥想的人。因为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触摸基督的身体……我想，在我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家庭里，我们不需要枪炮弹药来进行破坏或者带来和平——我们只需要团结起来，彼此相爱，将和平、喜悦和活力带回家庭。这样，我们将能够战胜世界上现存的一切邪恶。

我准备以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金，努力为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建立家庭。因为我相信，爱开始于家庭。如果我们可以为穷人建立家庭，我想越来越多的爱将会传播开来，而且我们将能够通过这种体谅他人的爱而带来和平，给穷人带来福音，这些穷人首先是我们自己家里的穷人，其次是我们国家和世界上的穷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修女、我们的生命就必须同祷告紧密相连。他们必须同基督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够相互谅解和共同分享。因为同基督结合在一起就意味着谅解与分享。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有如此之多的痛苦……当我从大街带回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时，给他一盘米饭、一片面包，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我已经驱除了那个人的饥饿。但是，如果一个人露宿街头，他感到不为人要，不为人爱，恐惧不安，被我们的社会所抛弃——这样的贫困如此充满伤害，如此令人无法忍受，我发现这是极其艰难的……因此，让我们经常以微笑相见，因为微笑是爱的开端。一旦我们开始彼此自然地相爱，我们就想做点事情了。

【介绍】

特雷莎修女（1910—1998 年），印度著名慈善家，被称为“贫民区的圣人”。1979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她为了把安全和幸福带给受苦的人，为了替濒于死亡的人消除痛苦和恐怖，在慈善机构里热心工作几十年，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庞大的慈善机构网，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敬。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认为她的特点是：“尊重人，尊重他或她的尊严和生来就有的价值。最孤独的人、最可怜的人和快要死的人都得到她的同情，而这种同情不是以恩赐的态度，而是以对人的尊重为基础的。”

《美丽的微笑与爱》的演说作于 1979 年。她说：“让我们经常以微笑相见，因为微笑是爱的开端。”

力量蕴藏在历史之中
——在美国的演说

（1915 年）

□泰戈尔

印度从无任何真正的国家主义意识存在。即使我自孩童时代就被教导要崇拜国家胜于尊敬上帝和人类，但是长大后我又不再相信这种说法了。我相信我的同胞若能摒弃“ 国家重于人类理想 ”的教育主张，将更能维护我们的祖国。

现在的印度知识分子都试着接受一些违反祖先遗训的历史经验教训。事实上，所有的东方国家都企图承认不是其本身生存奋斗结果的历史，譬如日本认为她是因为西化而日渐强大，但是当她耗尽其本身的文化遗产而只剩下那些借来的文化武器时，她发觉已无法自行发展了。

因为欧洲拥有属于她自己的过去，所以她的力量就蕴藏在她的历史中。我们印度必须坚定自己不向别人借用历史，假如我们抹煞自己的历史，那就无异是在自杀。你所借来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会摧残你的生命。

所以我认为印度在自己本土上竞相仿效西洋文明，是有百害而没有一利的。假如我们能遵循自己的道路，开创自己的道路，将来必然是受益无穷的。

我们必须确信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正等待那些有抱负有理想的人去开创。

为崇高的目标工作，以努力改善现有的生活是人人的特权。我们

不应一味盲目顺应别人成功的实例，或固守成规，一成不变。我们应该满怀理想，大步迈向无可限量的未来。

我们必须承认西方人来到印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是我们更应该将东方文化展现给西方人看，让他们知道东方人对世界文明是卓有贡献的，印度不会向西方人乞讨。虽然西方人可能会这么想。我并非有意排斥西方文化，采取闭关自守政策，我只希望东西方密切合作。

假如上帝是派英国来此地充任东西方合作的桥梁，我会十分乐意地接受。

我相信人性会促使西方人体验他们所承担的真正使命。但当我发觉你们的所作所为有辱其信誉及使命时，我不禁对西方文明有所微辞了。西方人不应该为了满足其个人私欲，使其强大国力来加祸这个世界。他们应该协助贫弱，教导无知，使这个世界免受更严酷的灾难，消除侵略和不公平现象。

同时，他们不应该以追求物质繁荣为依据，而应深深体验他们正在拯救道德世界免受物质凌虐而努力。

我并非特别反对某一个国家，我只是不同意许多国家对“国家”一词所持的一般观念，那么，国家究竟是什么？

国家是集合整个民族力量为一体的组织，它不断地力求殖民扩张，以提高效率增强国力，但是这种日以继夜追求强盛和效率的努力使人们精疲力竭，反而丧失了他原有的自我牺牲，努力创造的高尚本能。

人类不再为追求道德，转而为维持国家这个机械组织牺牲自己。他自觉已经满足道德标准。因此，形成人类世界的新威胁。当他向其以智慧创造而非完整的人格促成的国家尽职时，他的良心不再感到沉重的压力。因此，热爱自由的人们仍在许多地方保留奴役制度，并以完成国家责任为准绳。本性正直的人却容许残酷不义的思想和行为，还误以为自己在替天行道，赏罚严明。

所谓诚实人却不断地奴役低能者，剥夺人权以求自我扩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看到许多本性善良的人因经营商业而日趋冷酷无情。我们就可以想象“国家”这个组织已使人们争权夺利，在世界上造成一片道德混乱。

几年来我们一直是由态度绝对政治化的统治者支配，因此国家主

义已构成印度的一大威胁，而且成为印度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尽管我们已经继承了自己的文化遗产，试着自我发展，却不知将来国家的命运如何？

我相信印度最需要的是自我发展、奋发图强、努力建设，为此，我们必须历尽风险，坚守岗位，维持正义，不屈不挠以取得道德上的胜利。我们应该向那些支配我们的人类显示我们具有道德、勇气及力量，有为真理、正义受苦受难的耐力。

【介绍】

泰戈尔（1861—1941 年），印度孟加拉语诗人、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生于加尔各答市一个具有深厚的文化教养的家庭。曾留学英国，攻读英国文学与西方艺术。著有《吉檀迦利》、《园丁集》、《飞鸟集》、《新月集》、《戈拉》等 50 多部诗集、12 部中长篇小说、100 余篇短篇小说、20 余种戏剧等。所作歌曲《人民的意志》 1950 年被定为印度国歌。1921 年在桑地尼克创办国际大学。一生著作丰厚。其作品对英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妇女的痛苦处境表示同情；谴责封建制度和种族制度，描写帝国主义官僚的专横。诗歌格调清新，具有民族风格，同时带有神秘色彩和感伤情调。泰戈尔在印度享有崇高的声誉，被称为“诗圣”。他的创作对印度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191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毕生追求祖国的独立自由，坚持正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热爱和平，对中国怀有真挚感情。 1924 年访问中国，并出版了散文《在中国的谈话》。

泰戈尔认为西方人来到印度已经成为事实时，自己国家的人民应该竭尽全力做的是展现自己的文化，奋发图强，历尽艰险，维持正义，取得道德上的胜利。他 1915 年在美国发表的《力量蕴藏在历史之中》的演说表明的就是上述观点。整篇演讲，泰戈尔都是以自己善良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国民既不盲目顺应，又不固守成规，坚信国家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力量蕴藏在自己的历史之中。同时又期待东西方密切地合作，期待西方人是协助贫弱，教导无知，为世界免灾避难的。这篇演说表明了泰戈尔对国家、对人民命运的关注，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的自豪和敬仰。

如果世界上真有天堂……

（1940年 2月）

□福克纳

从我出生时起卡洛琳就认得我。为她送终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光荣。我父亲死后，在大妈眼里我成了一家之主，对于这个家庭，她献出了半个世纪的忠诚与热爱。不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来也不是主仆间的关系。直到今天，她仍然是我最早的记忆的一部分，倒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我行为准则和我物质福利可靠性的一个源泉，也是积极、持久的感情与爱的一个源泉。她也是正直行为的一个积极、持久的准则。从她那里，我学会了说真话、不浪费、体贴弱者、尊敬长者。我见到了一种对一个不属于她的家庭的忠诚，对并非她己出的子女的深情与挚爱。

她生下来就处在受奴役的状态中，她皮肤黑，最初进入成年时她是在她诞生地的黑暗、悲惨的历史阶段中度过的。她经历过盛衰变嬗，可这些都不是她造成的；她体会到忧虑与哀伤，其实这些甚至都还不是她自己的忧虑与哀伤。别人为此付给她工钱，可是能够付给她的也仅仅是钱而已。何况她得到的从来就不多，因此她一生可以说是身无长物。可是连这一点她也默默地接受了下来，既没有异议也没有算计和怨言，正因为不考虑这一切，她赢得了她奉献出忠诚与挚爱的一家人的感激和敬爱，也获得了热爱她、失去她的异族人的哀悼与痛惜。

她曾诞生、生活与侍奉，后来又去世了，如今她受到哀悼；如果世界上真有天堂，她一定已经去到那里了。

【介绍】

福克纳（1897—1962 年），20 世纪著名的美国现代作家。他生于密西西比州，参加过一战，读过大学，做过各种工作。他终生眷恋着家园，在故乡“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写下了卷帙浩繁的杰作，以毕生心血构筑起一个庞大的“约克纳帕塌法世系”。他的作品主要描写美国南方的历史、风俗人情，表现一个世纪以来南方社会的变迁及各阶层人物的升降沉浮，深深触及了现代西方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创伤，表明了他对 20 世纪人类命运的关注。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高超的意识流技巧和象征隐喻手法，丰富了其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我们熟知的福克纳作品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及《押沙龙，押沙龙！》等。

这篇演说辞是福克纳为家里的黑人女仆卡洛琳·巴尔大妈的逝世而作的。福克纳亲自在住宅的客厅里主持了巴尔大妈的葬仪，在她的灵柩前宣读了这篇悼词，并在她的墓碑上刻了“为她的白种孩子所热爱”的铭辞。当时，福克纳写信给友人说，“最近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做事。”由此可见，他对巴尔大妈的逝世是深感悲痛的。后来，福克纳又将《去吧，摩西》一书题献给巴尔大妈，并写了一篇生动的献词：“献给卡洛琳·巴尔大妈，密西西比人（1840—1940），她出生于受奴役的状态之中，曾经给予我的家庭一种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忠诚，也给了我的童年一种无法估量的深情与热爱。”评论界认为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的迪尔西和《去吧，摩西》中的莫莉都是以巴尔大妈为原型塑造的。

这篇演说十分真挚感人。全篇言辞优美，例证巧妙、层次清晰、语脉流畅、结构完整、浑然一体。

寻找人人得有归宿的世界

（1972 年 12 月）

□贝尔

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访问时，瑞典国王陛下，以深有教养的洞察力，看出了我们经历过，现在仍是我们居住基础的过去的种种面貌。德意志的土壤，既不是处女地，也不是没有污秽罪孽，而且绝对不曾平稳过。莱茵河畔的土地，拥戴了许多统治者，也经验了与此相当的多次战争，如殖民地战争、民族战争、地球战争、宗教战争、世界大战等，屠杀过犹太人，也有过放逐事件。不断有人从外地流入，而被驱逐的人则到外地去。这地方说德语已是极明显的事实，无需向国内外夸示这一点，以此为豪的反而是其他的德意志人，他们嫌软调子的 d 不充分，想用硬音的 t，逐自称“特意志人”。

一个人从已经逝去的过去走向正在消失的现在，在这条道路上处处都是暴力、破坏、痛苦与误解，碎片、瓦砾与废墟，无论是倾向西方还是倾向东方，都无法使他们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之后创造出大家期待的安定，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无法冷静下来的缘故。如果认为 A 太西欧化，B 太非西欧化，那也可以说 A 太国际化，B 太非国际化了。在这群骄傲的德国人中间，至今仍有强烈的怀疑念头。西欧化与德意志化的结合，不知何时开始存在着类似非神圣国民的欺瞒怀疑念头，倘若说这个国家果真有心脏的话，那么这心脏就是莱茵河流域，虽然她在抵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前已经流经了遥远的道路。

在孩提时代，我曾在学校里听到过“战争是万物之母”这一类体育精神式的格言，同时也在学校和教堂听到温和善良的人——即没有暴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倾向的人——可以得到承诺的土地。人们也许永远无法解决那杀人的矛盾：一些人有天堂和人间的承诺，而另一些人却只有天堂的承诺。这种情形曾在一个国家里出现，在这个国家，连教会都想加以控制，终于把教会收揽于手中,这一现象沿袭至今。

对我来说，从过去到达今天这一时刻，路是遥远漫长的。和数百万士兵们一样，当我从战场返回家乡时，除了插在口袋里的双手之外，一无所有；即使说与他人有异，那就是我有写作的满腔热忱，现在能使我表现的也只有写作而已。长久以来，被逐出故乡，四处飘荡，最后终于又回到受排斥的故乡。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这段坎坷经历，真不敢相信今天能站在这里，不是梦境恰似梦境。回乡后，我不仅躲避了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也得到了自由。我毕竟活了下来，我生于 1917 年，和平这个字眼对我来说既不是回忆的对象，也不是目前的现状，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而已。共和国也不是外来语，而是遭受折磨的回忆。在此，我要感谢那些使我获得精神解放的外国作家，是他们把我从闭塞僵硬中解放出来，剩下来就是我去征服那沾满了尘埃的语言，使它们还原。这语言已展现在眼前，却难以掌握，难以了解，我要感谢许多本国朋友和批评家对我的激励，也要感谢随之而来的考验。这种激励虽非战争但也难免要遇到某些抵抗。

战后的 27 年真像是一次长途行军，我不仅以作家身份说这话，也以市民的身份说这话。这确实是条漫长的道路，是从千夫所指的密林荆棘中奋斗开发出来的道路。开发道路的手指都是从迅速克服战败后的一切奇妙特殊的层次中发出的，而且以威吓的气势戳了过来，不少的指头里藏着可怕的子弹，那里面还有扳机。

我怀着不安之心，记起那些得过诺贝尔奖的德国前辈。他们在这可诅咒的独特性中，不许再做德国人。奈利·沙克丝幸得茜尔玛·拉格洛夫之助，才免于一死；托玛斯·曼被放逐，被剥夺了市民权；赫曼·赫塞迁离了这个独特的国家，荣获诺贝尔奖时早已不是德国公民。在我出生的前 5 年，也就是 60 年前，德国最近一个文学奖获得者，站在这个位置上；他是逝于德国的葛哈特·霍普特曼，尽管有些误解，他毕竟是在另一个非他所当属的德意志度过晚年。我既不是惟我独尊的人，也不是毫无个性的人。我是德国人，我那张不必由别人发给，

也不必延长的惟一正当的身份证明书，是用我开始写字时就使用的语言写的；以这种人亦即以德国人身份，我欣然接受这伟大的荣耀。感谢颁赠我此项荣耀的瑞典学院及瑞典国家，此一荣耀不仅颁给我，也颁给我用来表现的语言，与我所隶属的国家。

【介绍】

海因利希·贝尔（1917— ）德国著名作家，曾任世界笔会主席，生于德国科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7 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被称为战后德国“废墟文学”的代表作。贝尔 50 年代创作的小说多以战后联邦德国经济恢复时期普通市民的生命和命运为描写对象，较著名的作品是《九点半钟的台球》。60 年代贝尔的创作更为成熟，小说《和一个妇女的合影》是他的高峰之作。贝尔小说反复表现的基本主题是：“归宿的丧失与人道美学”。1972 年，贝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是：“凭借他对时代的宽阔视野，结合典型化的灵敏技巧，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

贝尔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这篇演说，大不同于一般的获奖演说辞。全篇没有兴奋之语，也没有多少感激之辞，甚至没有关于自己文学创作的一个字的说明。演讲人只想告诉听众的是：德国的战争和战争后的德国人。演讲内容之脱俗，对于一位世界级的大作家来说并非难事，难得的是他把这样一个原本与演讲场合完全无关的内容十分巧妙地联结在一起。

台风眼中的宁静

（1976 年 12月）

□贝娄

四十余年前，我是个非常矛盾的大学生。我习惯登记某一门课，然后研读另一领域的书本。所以，我本该死啃《货币与银行商务》时，却大读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我从来没有理由后悔。也许因为康拉德像美国人，才深获我心吧——他是流浪异国海洋的波兰人，会说法语，英文则写得出奇有力与优美。我是生长在芝加哥移民区的移民子弟——当然啦，一个斯拉夫人当过英国海军上尉，对马赛港一带很熟悉，写出的英语有东方风味，我总觉得再自然不过了。但是康拉德的“真实”人生没有什么奇妙的地方。他的主题直截了当——忠贞、指挥权、海洋传统、阶级组织、水手们遇见飓风时遵守的脆弱规矩。他相信这些看似脆弱的规条真有大力量，也信仰他的艺术。他的艺术观在《水仙号上的黑家伙》的序言中作了简单明了的阐述。他说，艺术是给可视世界以最高公正的一种尝试，它试图在这个世界里，在事物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作家获得本质的东西的方法，不同于思想家或科学家。康拉德说，思想家和科学家是通过系统的考察去认识世界的，而艺术家首先只是以他自身为对象；他深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在这个孤寂的领域里寻找“感人的言词”。康拉德说，艺术家所感动的“是我们生命的天赋部分，而不是后天获得的部分，是我们的欢快和惊愕的本能……我们的怜悯心和痛苦感，是我们与万物的潜在情谊——还有那难以捉摸而又不可征服的与他人休戚与共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使无数孤寂

的心灵交织在一起……使全人类结合在一起——死去的与活着的，活着的与将出世的”。

这一热情的论断大约写于 80 年前，生活在当代的我们接受起来不免会有所保留。我属于这样一代的读者，他们知道一长串高尚的或者听来高尚的词语，诸如“不可战胜的信念”“人道”等等曾经遭到厄内斯特·海明威等作家屏弃的词语。海明威可以说是那些在伍德罗·威尔逊和其他夸夸其谈的政治家鼓舞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的代言人。这些政治家的豪言壮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应当用满铺在战壕里的僵硬的年轻人尸体来衡量。海明威的年轻读者们深信：20 世纪这些惨不忍睹的事件，以它们致命的辐射，摧残和毁灭了人道主义的信念。因此，我告诫过自己，必须抵制康拉德的大话。但是，我却又从来没有认为他是错的。他的话像是直接对我而说的。富于感情的人显得软弱——他总觉得自己满身全是弱点。但是，假如他承认自己的弱点，承认自己的离群，从而能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断加深自己的孤独感，那么他就会发现，他和其他孤独的人是心心相印的。

现在我不需要再怀疑康拉德的话了。但对有些作家来说，康拉德的小说——所有那一类小说——已经过时了，完结了。例如，有一位叫罗伯一格里耶的先生，他是法国文学的领袖人物之一，“实物主义”的代言人。他写道，在萨特的《恶心》、加缪的《局外人》，或者卡夫卡的《城堡》这些当代名著中，都没有人物；你在这些作品中找不到个体，而只有统一体。他说：“描写人物的小说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它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特征——那个个人至上的时代的特征。”这并不一定是一种进步；罗伯一格里耶也承认这一点。可是这是事实。个性被抹煞了。“还不如说目前是一个行政号码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世界的命运已不再与某些家族的个人成败共兴衰。”他接着说，在巴尔扎克的那个资产阶级时代，姓氏和个性很重要；个性是为生存和成功而斗争的武器。那时，“在世界上，有一定的个人面目还是重要的；因为在一切探求中，个性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的结论是，我们的世界更加谦虚，它抛弃了个人全能的观点，但它同时具有更大的雄心，“因为它的目光放得更远。对‘人’的专一崇拜，已经让位给一

种更为广泛的，不那么强调人类中心说的意识。”可是，他又安慰我们说，我们面前有着新的途径和得到新发现的希望。

在这样的场合，我不想进行论争。我们都知道对“人物”的厌倦意味着什么。典型人物已经变得不真实，而且令人厌烦。D·H·劳伦斯在本世纪初曾经说过，由于我们的本能遭到清教主义的损害，人类不再彼此关怀——而是互相厌恶。他说：‘同情心破碎了。’他接着又说：“人与人是掩鼻而过。”此外，在欧洲，有好几个世纪，古典文学的威力竟大到使每个国家都有源自莫里哀、拉辛、狄更斯或巴尔扎克的“易于辨别的人物”。多么可怕的现象！这也许与一句极妙的法国格言有关：“一有个性，事情就糟了。”这句话使人想到，喜欢模仿的人类往往从方便的来源获取需要的东西，正如新城往往在旧城的瓦砾堆上建成。而且，根据精神分析的学说，本性的构成是丑恶的、僵硬的——它，我们只能忍从以对，不是一种可以欣然接受的东西。极权主义思想也攻击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有时还将人物的个性与阶级的特性等同起来。罗伯一格里耶先生的论证中多少也有这个意思。对个性、拙劣的假面具、虚伪的存在的厌恶，有其政治上的后果。

但是在这里，我感兴趣的是艺术家优先要考虑的问题。一个艺术家是否必须从历史分析，从观念或学说着手，这样做好不好？普鲁斯特在《过去韶光的重现》中提到，年轻的、理解力强的读者，越来越偏爱具有高度的分析性倾向、道德问题或者社会问题倾向的作品。他说，他们喜欢自己认为较为深刻的作家，而不喜欢伯格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小说家）。‘但是，’普鲁斯特说，‘自从对文艺作品用推理作评价以来，什么东西都不是稳定或确实的了。人可以证明他想证明的任何东西。”

罗伯一格里耶的寓意并不新奇。它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涤除资产阶级的人类中心说，做适应我们高度文明要求的时髦事。人物呢？“病了五十年，严肃的论文家们已经多次签署过它的死亡通知书，”罗伯一格里耶说，“但自从十九世纪把它放上了受人崇敬的宝座以来，至今还无法把它全部推倒。现在它已成了一具木乃伊，但仍然道貌岸然地——尽管很容易戳穿——和其他受到传统评论崇敬的社会价值一起，蹲在宝座上。”

罗伯一格里耶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几个陈腐的观念》。我本人也厌烦陈腐的观念和各式各样的木乃伊，但是我对于阅读小说大师的作品却从未感到厌倦。对于他们书中的人物，该怎样处理呢？是否应当停止对人物个性的研究？难道书中人物身上那么栩栩如生的东西，现在已经完全失去生命了吗？难道人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个性真的那么依赖于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那种种如此“权威地”向我们作的有关这些条件的解释，我们能同意吗？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人的固有兴趣，而在于这些观念和解释。它们的陈腐与缺陷使我们感到厌倦。要想找到问题的根源，我们还得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头脑。

“最严肃的论文家们已经签署过”人物死亡通知书一事，只不过意味着另一群木乃伊，即知识界最受尊敬的人物，立下了这件法令。我感到可笑，竟然容许这班严肃的论文家去签署文学形式的死亡通知书。艺术应该遵从文化吗？肯定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了。

一个小说家要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并不是不可以放弃“人物”，但是以标志个人至上的时代已成陈迹等等为理论根据而这样做，那是荒谬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知识分子支配一切。听任他们去操纵艺术，对他们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他们看小说的时候，除了赞同他们自己意见的东西外，从中就什么也不找了么？我们在这地球上就为了玩这样的游戏？

伊丽莎白·鲍恩曾经说过，人物并不是作者创造的。他们早就存在，必须去寻找。假如我们不去寻找，假如我们不能重视他们，那是我们的过错。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要找到他们是不容易的。人的状况也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难于明确阐述。那些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界历史的初期的人说得对。我们可以说是过多地涌流在一起了，似乎正在经历形成新的意识形态的痛苦。在过去 40 年里，美国几百万人受到了“高等教育”——在很多情况下说不清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在 60 年代的社会制度中，我们才首次感觉到现代的学说、概念和感情的影响，以及心里、教学和政治观念的渗透作用。

每年都有许多书和文章告诉美国人，他们的处境是如何如何不妙——其中有的明智，有的天真，有的言过其实，有的危言耸听，也有的像是狂人呓语。他们都反映了我们所处的危机，同时还告诉我们应

该怎样对待这些危机；这些分析家正是他们为之处方的混乱和不安的产儿。我作为一个作家，正在思考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对道义的极端敏感，对完美状态的想望，对社会缺点的不能容忍，他们那种感人的同时又是可笑的无止境的要求，他们的忧虑、急躁、敏感、脆弱，他们的善良，他们爆发性的情感，他们对待吸毒、接触疗法和投掷炸弹的轻率态度。曾经是耶稣会教徒的马拉奇·马丁在一本关于教会的书中，把现代美国人比作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奴隶》。他从雕像那一大块物质中，看到“一场没有止息的斗争正在完整地显现出来”。马丁说，这个美国“奴隶”在其斗争中受到重重围困，这种围困来自“那些自封的预言家、祭司、判官和他的苦难的制造者，他们对他做了种种解释、劝戒、警告和描述”。

让我花点时间比较仔细地来看一下这种苦难吧。在个人生活中，是不安或者近乎恐慌；在家庭中——对丈夫、妻子、父母、孩子来说——是一片混乱；在公民品行、个人忠诚和性生活方面（我不愿列举所有的方面，对此我们已经听腻了）——则更加混乱。而且，随着个人不安而来的是全社会的困惑。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过去经常在科学幻想小说中引起我们兴趣的事情——《纽约时报》提到了死光和苏美两国的太空卫星战。在 11 月份的《遭遇》杂志上，像我的同事米尔顿·弗里德曼那么稳重而又负责的一位经济学家，竟然宣告英国由于政府的大量开支很快会步智利那样穷国的后尘。他被自己的预测吓坏了。这可能吗？难道大宪章以来一直是自由和民主的伟大传统的发源地将以独裁政治而告终？“在这一传统中养育起来的任何人，几乎都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英国正处在失去自由和民主的危机之中；但这是事实！”

我们正试着和这些把我们打翻在地的事实共处。假如我有机会和弗里德曼教授辩论的话，我可能要请他考虑风俗习惯的阻力，英国和智利两国的文化差异，民族性格和传统上的不同；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投入一场不能获胜的辩论，而是请你们注意我们不得不勉强接受的可怕的预言、混乱的背景与毁灭的景象。

你们可能认为在一期杂志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已经足够了，但是《遭遇》杂志的另一页上，还刊载有休·塞顿一沃森教授对乔治·凯南

的新作的论述。凯南最近对美国的堕落及其对全世界的可怕意义进行了研究。在论述美国的失败时，他提到犯罪行为、城市衰败、吸毒问题、色情文化、轻薄无聊、教育水平下降等等；他断言我们的巨大力量实际上毫无价值。我们不能领导世界，而且由于罪恶的侵蚀，我们也许无法保卫自己。塞顿一沃森教授写道：“假如居社会顶层的 10 万男女，包括决策人和帮助形成决策人思想的人，都决定投降的话，那就无法保卫一个社会。”

关于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就讲这些。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们又怎样呢？我在《遭遇》杂志上又翻到剑桥大学英语讲师乔治·沃森先生写的一篇关于左派种族主义的短论。他告诉我们说，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始人海因德曼把南非战争称作犹太人的战争；他说维伯夫妇有时表露了种族主义观点（他们之前的罗斯金、卡莱尔和 T. H. 赫胥黎也表露过类似的观点）；他说恩格斯曾把东欧一些较小的斯拉夫民族贬为反对革命的种族渣滓；沃森先生最后引证说，西德“红军派”的乌尔里克·曼霍夫，在 1972 年法院审讯她时，曾声明赞同“革命的消灭”。在她看来，希特勒时期的反犹太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反资本主义的。有人引述过她的话：“奥斯威辛意味着 600 万犹太人被杀害和被扔到了欧洲的垃圾堆上，作为有钱的犹太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提到这些左派种族主义者是为了表明：对我们来说，在光明与黑暗的追随者之间没有简单的选择。善与恶并不是对称地按政治路线来划分的。但是我已经说明了我的论点；我们面对着来自各方的忧虑；我们天天为之担忧的是一切事物都在衰退和崩溃，我们既为个人生活而不安，又被社会问题所折磨。

还有艺术和文学——它们怎么样呢？是啊，是有一场激烈的骚动，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受它支配。我们还能思考、鉴别和感受。更为纯正、精妙、高尚的活动，并没有屈服于狂暴和胡闹，还没有。人们还是在写书和读书。要打动一个现代读者混乱的心，或许是更为困难的了，但穿过喧嚣到达宁静的地带还是可能的。在这宁静的地带里，我们会发现他们正在热诚地等待着我们。探索本质问题的愿望随着精神混乱的加剧而增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无尽期的危机形成了这样一种人，他们经历过可怕的千奇百怪的事，在他们身上偏见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